

編者按

眾所周知，中國大陸學界有關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研究，由於受到國內外政治、外交等因素制約，擺脫不了意識形態窠臼，結論傾向整齊劃一，沒有太多深入的學術探討空間。近二十年來，隨着中國外交部檔案和各地省市檔案的開放，加上俄國檔案陸續解密以至翻譯成中文出版，配合新興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方法，大大推動了國內外有關中國邊疆問題/中外關係史的研究。尤其不能不提的是，近年有學者開始利用蒙古外交部和檔案總局的蒙文檔案，探索以往較受忽視的中蒙關係問題。本期「學術論文」欄目刊出的四篇論文，都是基於多邊檔案文獻研究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成果，探究的焦點分別落在中國北方(中、蒙)與東北(中、蘇、朝)的邊界之上，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填補了重要的缺環和空白。

1945年2月，美、英、蘇三國簽訂《雅爾塔協定》，同意「維持外蒙古現狀」，變相認可蘇聯延續對外蒙古事務的主導性影響力。谷繼坤的文章為我們理解當時的「外蒙古現狀」提供了重要的背景：從1925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驅逐共產國際駐蒙古全權代表雷斯庫洛夫說起，娓娓道來此重要事件促成蘇聯深度介入蒙古事務，通過扶植「農村派」，改組蒙黨中央，將外蒙古改造成蘇聯衛星國的來龍去脈。根據1945年8月中蘇兩國簽訂的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，國民政府容許外蒙古通過公民投票決定其獨立的主張，誠如白林在文章中指出，這完全是大國博弈的產物。同年10月，外蒙古舉行的獨立公投事實上是一場早有定論的選舉，當局力圖通過一系列選舉操作，實現「百分之百」贊成獨立的選舉結果，從憲政法律層面正式切斷外蒙古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。1949年以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「一邊倒」的外交政策，中蒙兩國在共產主義陣營內成為「同志」/「兄弟」，然而隨着1960年代中蘇分裂，中蒙關係亦轉趨緊張。劉曉原在文章中除了探討箇中涉及的意識形態因素外，也從地緣、民族政治角度作出深入解讀。至於郝江東的論文所關注的東北抗聯史研究狀況，與上述中蒙問題表面看似毫不相干，但實則也有雷同之處：特別是受制於1949年以來中、蘇、朝三國關係的高低起伏，相關研究呈現不同的階段性特點與變化，其中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考量所起的重要作用，並無二致。